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从“塘约经验”看乡村振兴 战略的内生实施路径*

冯道杰 程恩富

【提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有分无统”的个体经营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部署。贵州省塘约村在党组织领导下,在确保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实现了集体快速脱贫奔小康,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为现阶段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邓小平关于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思想,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 邓小平关于农业的“两个飞跃”思想 “塘约经验” 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1-0022-11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实施的重大战略之一,对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的“第二个飞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使农民获得了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和对承包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监督激励问题,调动了个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78~1984年,我国农业发展七年持续繁荣,在短时期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较快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见表1)。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激励作用逐渐减弱,体制优越性不再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加大(见图1),农民税费负担不断加重,集体资产大都被分光卖净,村庄出现离散状态,农村资源不断外流,基础设施失修,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15BKS0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公共事业发展滞缓，“空壳村”和留守老弱幼增多，党支部缺乏威信，信仰缺失、人心涣散、干群冲突等各类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三农”问题一度陷入困局。2003年以后，虽然受到国家扶持政策和免除农业税等因素的刺激，粮食产量出现连续递增的好势头，但是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水平并未因此发生实质性改变。随着家庭经营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大部分村庄恢复到个体小农经济状态，双层经营变成了“有分无统”的家庭分散经营，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无力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村环境整治，难以独立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社会风险等，难以适应推广农业科技和先进机械的要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缓，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出现了“五化”（农村空心化、务农老龄化、要素非农化、农民兼业化、农业副业化）、“双高”（高成本、高风险）、“双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青壮年劳动力紧缺）的新形势、新问题，^① 依靠个体农户的力量难以推进农村新“四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表 1 1978~1984 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大宗农产品产量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粮食（万吨）	棉花（万吨）	油料（万吨）
1978	1458.85	30475	216.7	521.8
1979	1584	33217.75	220.7	643.5
1980	1627	31822	270.7	769.1
1981	2312	32502	296.8	1020.5
1982	2785	35343	359.8	1181.7
1983	3121	38728	463.7	1055
1984	3612	40712	607.7	1185.2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相关年份数据整理，<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2017年9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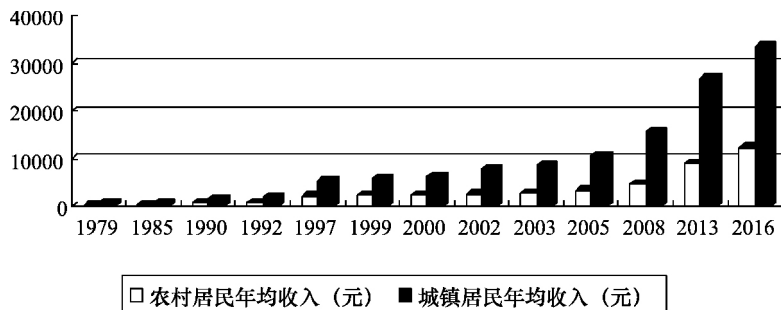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图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相关年份数据整理，<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2017年10月18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本是包含“统”与“分”两个经营层次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为主导，

^① 李铜山、刘清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评述》，《中州学刊》2013年第3期，第48~54页。

家庭层面分散经营为基础，“统”与“分”相结合。其制度设计的创新之处在于，村庄集体层面对分散农户经营提供统一服务，降低农户生产经营成本，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不好办、办不好”的事情和困难。但是，长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结果是“分”被加强或“一分为之”，“统”被弱化或完全消失。大多数村庄分田到户后，集体资产被分光卖净，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固定资产，丧失了经营功能，服务于广大分散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直难以建立和完善；许多农村“一分为之”，任凭个体农户自生自灭、自然分化。失掉集体组织依托的个体农户，依靠小块分散的土地不仅无法推进农村新“四化”，而且引发了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如农民增收困难、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农业生态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等。“有分无统”的家庭个体经营已经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亟待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问题，邓小平曾多次谈到“两个飞跃”的思想。1990年3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比较具体地谈到这一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① 1992年7月，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再次阐发了农业“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限，甚至超过区的界限。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② 邓小平关于农业的“两个飞跃”思想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阐述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规律，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正确道路。^③ 我国部分地区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可以通过新的集体化、集约化实现农业的“第二个飞跃。”^④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农村农业发展已经到了实现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飞跃”的新阶段：第一，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已实现由人力畜力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第二，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经济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大幅度提高，已适应集体化、集约化管理的要求；第三，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的多种经营得到很大发展，农林牧副渔、农工商等的市场化经营已达到较高水平，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程度日臻完善；第四，部分农村集体收入不断增加，只要政府强调和支持集体层经营，措施得力，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就会很快提高；第五，当前我国已发展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新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装备水平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端，而多数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也得到基本解决，“第一个飞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迫切需要向“第二个飞跃”过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二、塘约村是短期内脱贫奔小康的乡村振兴典范

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②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页。

^③ 尹广泰：《邓小平晚年思考的几个问题》，《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第58~65页。

^④ 侯亚景、罗玉辉：《中国农村土地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海派经济学》2017年第2期，第82~93页。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① 贵州省塘约村在 2014 年一场大洪灾后通过新的集体化、合作化，经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不仅实现了全部脱贫、由贫困村转变为小康村，而且基本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邓小平关于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思想，提供了成功的典型范例。

塘约村是典型的山区传统农业村，辖 10 个自然村、11 个村民组，921 户 3393 人，耕地面积 4860 亩，人均耕地面积约 1.43 亩。该村在 2014 年以前是国家级二类贫困村，土地撂荒率达 30% 以上。2014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让塘约人从贫困、灾害中奋起。穷则思变。塘约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托村党组织、村委会、合作社“三套马车”共同发力，通过“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等充满活力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体抱团发展。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足 4000 元提升到 10030 元，村集体经济由不足 4 万元增加到 202.45 万元，贫困户由 138 户 600 人减少到 25 户 92 人，走出了一条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壮大集体经济、共同实现全面小康的崭新道路，完成了从贫困村到小康村的转变。^② 塘约村集体脱贫的发展之路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宏甲多次深入塘约村调研，出版了报告文学《塘约道路》。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对“塘约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塘约村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突出党建引领作用，推行“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建立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对村支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议事会实行三级考评，完善村委会自身监督、监督委员会监督、村民小组监督“三方”监督制度。正是有了以村支部书记左文学为代表的甘于奉献、勇于担当、有能力、有头脑的带头人，有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共产党人，塘约村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才发展起来，才实现了集体脱贫，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党员帮村民排忧解难，向党组织反映社情民意；村民对党组织的决策意图也能够及时了解，农民群众与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心向一处用，劲往一处使，党员与村民打成一片。

塘约村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形成了村庄发展的合力和内生动力。为了密切村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的联系，塘约村设置了“村民组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村民小组，每十五户农民都能够选举自己的组长，架起了与村党组织等沟通协调的桥梁。塘约村把党小组设在村民组上，负责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村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每个村民组既有党小组又有组委会，二者互相监督、互相支持，把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塘约村以党支部为引领，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成立了“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社区综合性农民合作社——“金土地合作社”。村支两委与合作社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鼓励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资金入股等方式联合起来，制定股权管理制度，建立股东个人档案，发放股权证书，入社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合作社下设土地流转中心、股份合作中心、金融服务中心、营销信息中心、综合培训中心、权益保障中心，形成“1+6”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有效解决农村土地零散低效、贫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② 省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塘约经验”调研报告》，《贵州日报》2017 年 5 月 18 日。

困户资金难以筹集、市场风险难以抵御、村民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在合作社内部组建运输公司、劳动输出公司、妇女创业联合会和建筑公司等经营实体，加强对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全村实行资金统一核算、土地统一规划、村干部统一使用、财务村务统一核算、农产品统一销售、美丽乡村统一建设、红白喜事统一操办“七统一”，更好配置全村资源，提高发展效率。^①塘约村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突破了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等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把全村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优化配置，推动了农村生产生活由分散式向集中规模化方式转变，村民从单打独斗的个体小生产转变为连片开发、机械化耕作、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化大生产，增强了抵御自然和市场等各类风险的能力，提升了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经营效益，形成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强弱联合、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使得村民与村庄构成利益共同体。

在上级党组织的引领下，塘约村大胆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权、赋权、易权”，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盘活各种资源，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解决村庄发展所需资金和产权界定等问题，巩固了农村资源集体所有权，维护了农民土地承包权，放活了土地经营权。^②所谓“确权”，就是指“七权同确”，即对村民的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和农村集体财产权等七项农村产权进行确权登记，明确全体村民是集体财产和村庄社会的主人，明晰了每户农民和集体资产的权益。^③

所谓“赋权”，就是赋予农村产权更多的权能。塘约村落实安顺市平坝区相继出台的《平坝区“三权”促“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平坝区开展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方案》《平坝区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平坝区金融机构精准扶贫金融服务实施方案》《平坝区“特惠贷”风险补偿金实施细则》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健全土地储备、产权评估、利益共享、风险保障、金融支撑等配套措施。^④

所谓“易权”，就是把各项产权权能用于市场交易，盘活资产。为打通易权“梗阻”，塘约村引进金融机构入驻，建立村级金融担保基金，每年从村集体的利润分红中抽出20%作为村级金融担保基金，完善农信社、合作社、农户各方利益联结机制与风险共担机制，创新“金土地贷”、“房惠通”、“特惠贷”等信贷产品，引导农村经济组织、公司、专业大户、农户等产权主体通过各类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让合作社、村集体及农户抱团发展。^⑤

“塘约经验”是让分散的资源聚集化、统一的产权分解化、集体的资产市场化，再造双层经营“统”的功能，推进农民由“分”到更高层次的“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完善“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次成功尝试，是邓小平关于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思想的一个实践方向，走出了一条农村贫困地区依靠农民自身力量短时期内实现脱贫奔小康的改革新路。^⑥

① 省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塘约经验”调研报告》，《贵州日报》2017年5月18日。

② 王宏甲：《塘约道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4页。

③ 资料来自笔者2017年5月在塘约村的实地调研。

④ 资料来自笔者2017年5月在塘约村的实地调研。

⑤ 资料来自笔者2017年5月在塘约村的实地调研。

⑥ 省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塘约经验”调研报告》，《贵州日报》2017年5月18日。

三、“塘约经验”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实施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的“第二个飞跃”，需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民要求的内生路径。中国人多地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既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以高补贴维持小农经济的做法，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塘约村的成功经验表明，即使是在贵州省这样相对落后地区的一个贫困山村，现阶段依然可以通过新的集体化、集约化，实现集体脱贫奔小康，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塘约经验”体现了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邓小平关于农业的“两个飞跃”思想的有机统一，昭示了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实施路径，即在党组织领导下，在确保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协作化、合作化的集体力量，大力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发展生产、建设乡村、美化家园。

所谓内生发展，是指村庄农民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众多困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培育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本质上就是要培育和提升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必须有农民和农村的小康。所谓“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就是小康的实现不仅仅是外力帮助的结果，不是外界给予一定帮助、短期内解决了贫困，而是内生的、内在的、可持续的。缺乏内生发展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小康，很难持续，很容易再度返贫，更难以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①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的扶贫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使其处于“被扶贫”状态。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情况非常复杂，依靠外力援助实现脱贫奔小康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往往只是阶段性地解决问题。塘约村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成功走出了一条在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上重新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道路，实现了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解决了农村发展的合力和内生动力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指出，“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软弱涣散基层班子的问题，发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是一盘散沙般的弱势群体。同样，党一旦脱离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逐渐丧失生命力。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让人民监督权力。正如《塘约道路》一书指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③塘约村把党组织嵌入村民小组、合作社等各种组织，推动党组织延伸到农民群众生

^① 李贞、雷冀鸣整理：《习近平谈扶贫》，《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9月1日。

^②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6月23日）》，《党建》2017年第9期，第8页。

^③ 《塘约道路》，第114页。

产生活第一线，使群众身边都有党，党就在群众身边，把党的力量延伸到村组农户。^①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② 长期以来，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趋于消散，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农民群众如一盘散沙、人人自利。村庄公共事业很少有人过问，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越来越松散。事实表明，农村越来越需要愿意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任务紧迫而艰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决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做到的，必须要扑下身子，立足农村基层，真抓实干。塘约村发生的变化，正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出现的。塘约村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分田单干三十多年的个体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关键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愿意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塘约村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促改革、奔小康的典范。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治理的过程，呈现为干群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在基层社会筑牢共产党执政之基的过程以及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合力和动力的过程。

第二，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只有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依托集体化、合作化的力量，农民群众才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真正主人。一般说来，农民单靠种养殖业和外出打工只能解决温饱和日常花销问题，仍然富不起来。农民组织起来，比个体单干在资金、技术、信息、社会协作关系等方面更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有更大的抗风险能力、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更高的规模效益。

组织农民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化的经济组织，最有效的方式和渠道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形成社会组织 and 经济组织合一的村社共同体。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政治保障，党的理想信念是农民组织起来的精神动力，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是农民组织起来的制度和物质基础。现实表明，仅仅基于血缘、地缘等纽带很难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仅仅在社会事务方面加强联系合作是不能够保证组织的可持续性的，必须要有不断发展壮大的物质基础，必须在实现自主联合的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组织范围过小，组织起来依然没有效果；组织范围过大，等于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搭便车”机会，组织效能会大大下降。研究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村治理模式的创新。^③ 塘约村的探索已经显示出把农民组织起来、调动起来的强大生命力。

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有乡村内生对接机制。如果没有组织化的农民，任何一种对接机制和服务体系联接千家万户的个体小农，都会成本高、效益低。塘约村每十五户农民设立“村民组委员会”，并设立党小组，架起村党组织与村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在党的领导下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村民组成员之间彼此熟悉、相互帮扶，形成了组织化的集体，不仅农民之间的凝聚力增强、交流增多，而且发展社区公共事业、处理社会事务以及向上级表达意

①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塘约村抓好党建促改革发展调研》，《党建研究》2017年第7期，第52~55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 刘德浩：《“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与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成都市农村产权改革的调查》，《管理学报》2016年第5期，第36~42页。

见建议，都有了组织依托，增强了农民的话语权，使得社情民意有了表达的组织载体和制度化渠道。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塘约村组建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塘约经验”的最大价值之一，是通过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自己的内生力量来克服困难，充分发挥了人民主体作用，摆脱了主要依靠“他者”扶贫的思维，是真正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自身组织起来的力量解决实际问题的典范。

第三，确保农民主人翁地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保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关系乡村振兴成败的重要环节。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只有确保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才能真正激发和调动农民参与集体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没有农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管理，公有制就容易变为“官有制”。塘约村努力探索出一条在农民重新组织化、集体化进程中实现民主管理和民主治理的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巩固了农民群众的发展主体和主人翁地位。塘约村的“七权同确”贵在巩固集体所有制，这正是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的根本保证。当村民在这个集体中体会着有尊严的劳动生活时，才有主人的地位，这是产生“内生动力”的真正的源泉。从人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的解放。^①塘约村的成功，不仅仅是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的成功。组织起来的农民实现民主管理和民主治理，才能形成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与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相辅相成。

长期以来，农村基层民主问题重重，如贿选问题，基层组织软弱无力问题，族群、宗派和涉黑势力对选举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村社内部的“撕裂”问题等，这充分证明村社内部的民主机制最关键的不是选票，而是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知识化程度和水平，改变农民以分散个体的方式监督村干部集体的状态。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并不是说等份地让农民个体分散投票，而是让比较熟悉情况的农民以合适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集体事务、监督村干部。把农民组织起来和确保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是塘约村具有内生发展动力的两个最基本条件。“人民当家作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处理好自由与秩序、民主与集中、多数人民主和尊重少数人等问题。“人民当家作主”不等于“人人当家作主”，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作主”、“每个人都能说了算”。只有因地制宜地运用好民主集中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尊重民意、吸纳民智，在民众更多参与的基础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塘约村成功最重要的一项经验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治理，让基层领导干部处在农民群众严密的监督与考评之下，密切党群关系，为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农民组织化不是农民依附于资本的“被组织”、“被雇工”、“被入股”，也不是行政命令干预下的“被集体”、“被合作”，而要切实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发展劳动者的自主联合体。塘约村在村党委会、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充分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建立了严格的民主考评和任免机制，对每个干部、党员都要进行严格打分考核，把得分多少与报酬直接挂钩，村庄事务由农民群众集体说了算，保障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各项权益。塘约村严格按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实行村级事务“四议两公开”^②，

^① 《塘约道路》，第65页。

^② 四议是支委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即村重大事项首先由村党支部集体研究后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充分讨论、协商一致后，交党员大会审议，随后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表决；两公开是决议公开、实施过程和结果公开，即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事项，实施过程和结果要通过适当途径向全体村民公开。以上内容来自笔者2017年5月在塘约村的实地调研。

制定了国家公职人员、村干部落实惠民政策行为规范“四要”^①、“五严禁”^②并张贴上墙，时刻警示所有公职人员和村干部。塘约村还专门成立了“民生监督组”，设立了民生监督办公室、村民权益保障中心，制定了民生监督组工作职责，设立了民生监督组联络员、信息员，制定了民生项目资金监督流程图并张贴上墙。塘约村通过村民选举产生合作社监督委员会，加强对土地征用与流转等工作的监督，强化村民对合作社集体资金收益、利润分红、基础建设、村级公益事业、集体资金使用等的跟踪监督，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第四，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党在农村执政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物质保障。习近平指出，“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居住着60%的贫困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村两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强，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③没有集体经济，基层党组织便难以动员农民、组织农民、整合农村资源，也难以推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就失去了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塘约村通过设立村民组委员会、党小组，在政治上、社会关系上、情感上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把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还通过设立农民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健全和完善合作社经营管理机制，在生产生活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村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者的自主性联合，使得村民与村庄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组织农民有了物质基础，从而真正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自身的力量建设乡村、美化家园。

当前农村发展的道路分歧在于：是农民依靠基层党组织走集体化道路、有序发展农村适度规模经济，还是依靠私人资本、种田大户雇佣农民来发展规模化私营农场？众所周知，有劳动能力的农民一旦把承包地确权后的经营权出卖给大户或外来老板，农民自身就丧失了对承包地的经营权，只能替人打工。虽然农民也能拿到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却由此丧失了土地主人的地位。^④从本质上说，新中国是靠最广大的穷苦人民组织起来才得以建立的国家，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及其利益是立国之本。“共产党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穷棒子们改变被雇佣的佃农身份、打工身份（打长工或打短工）。”^⑤没有集体经济和集体组织依托，失掉承包土地的个体农民无力抗衡社会资本力量而不得不沦为雇佣工人，不仅农民群众失去了当家作主的物质基础，而且党也就失去了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只有联合和组织起来，落实邓小平关于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思想，走新的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民的弱势地位，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能忽视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的基本农情。”^⑥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不适合大规模发展西方的资本雇工农场，即便是发展平均200亩的家庭农场，18亿亩耕地仅仅能够吸纳两千万左右的劳动力，剩余大量农民如何安置？占村庄人口80%以上的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如何解决？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稳定如何保障？

① 一要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民意；二要公开透明，规范权力行使；三要民主决策，确保公平公正；四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以上内容来自笔者2017年5月在塘约村的实地调研。

② 一、严禁优亲厚友。二、严禁吃拿卡要。三、严禁虚报冒领。四、严禁截留挪用。五、严禁贪污私分。以上内容来自笔者2017年5月在塘约村的实地调研。

③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6月23日）》，《党建》2017年第9期，第5页。

④ 《塘约道路》，第36页。

⑤ 《塘约道路》，第22页。

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 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督察关 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是当前农村改革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①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② 振兴乡村、建设家园的主力军是广大农民。塘约村的发展印证了仅仅依靠农民个体家庭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幻想依靠私人资本的力量建设乡村、富裕农民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才能真正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乡村振兴。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③ 相对于一般私营和个体经济而言，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不仅更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而且在民主管理运营、社区责任、社会治理、共同富裕等方面有着更多综合优势。塘约村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同时，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成立了股份合作中心，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引导农民自愿把承包土地、林地、宅基地等以“资产”形式流转给集体，走“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道路，依托集体化、组织化的力量，实现了从个体小生产到现代大生产的转变，让农业产业“强”起来，同时积极拓展和延伸产业链条。家乡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吸引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建设家园，从而解决了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以及农村人财物流出等问题，为农民集体致富、社会有效治理、乡村振兴提供了资源和物质基础。“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④

组织发展的关键取决于组织起来的收益是否大于单干，换句话说，加入组织的农民是否比个体单干有更多更大的收益。这取决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效益与质量，取决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力和水平。而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力和水平，又取决于民主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在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管理，才能确保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增强其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发挥其建设家园、振兴乡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务之急，就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思想，积极整合农村集体资源，充分发挥组织化和民主管理的优势，在客观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第五，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习近平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⑤ 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让农民和农民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是提高其获取财富能力的治本之策。塘约村坚持扶贫与扶智同步，“富脑袋”与“富钱袋”并重，成立了综合培训中心和塘约道路讲习所等，制定培训规划，建立导师库与实践基地，邀请专家学者进村，完善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体系，提

① 《塘约道路》，“导言”，第1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30日。

④ 《塘约道路》，“导言”，第2页。

⑤ 李贞、雷龚鸣整理：《习近平谈扶贫》，《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9月1日。

高农民文化素质和合作社管理水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的“第二个飞跃”，不仅需要客观物质环境的不断改变，更需要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精神追求等主观世界的不断改造与提升。仅仅在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仍属于建立在“物”的层面的低层次的发展，还需要在政治上、精神文化上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合作化，建立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组织文化和组织形态。村庄文化更多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和发展特质。能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村庄文化建设，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到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实现与村庄文化的融合，内化为农民自身内在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为，才能更好地引领农村文化建设，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村庄文化的支撑和引领，村庄发展就会失去灵魂和方向；没有村庄发展承载的村庄文化，则会变成空洞苍白的说教。

塘约村把村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村规民约是由村民全体决定的，不仅体现了民主治村的理念以及村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而且是移风易俗、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塘约村把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利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滥办酒席、不讲诚信、乱建房屋、不赡养父母等陈规陋习，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研究讨论并一致通过后颁布了“红九条”村规，对违规者一律列入“黑名单”。“红九条”村规成为该村村民行为的道德准绳，在规范村民行为举止、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冯道杰是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程恩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特聘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责任编辑：任朝旺

The Endogenous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Experience of Tangyue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Feng Daojie Cheng Enfu

Abstract: At present, bo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In such circumstances, “divided but non-unified” individual manage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developmen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ployed arrangements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efore this, Tangyue village of Guizhou Provi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farmers’ mastership of their own affairs, had reorganized farmers, developed and expanded the local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operative economy to collectively throw off poverty and achieve collective prosperity. Their experience provides a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Deng Xiaoping’s “second leap” thought.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eng Xiaoping’s “two leaps” thought on agriculture; the experience of Tangyue villag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operative economy